



Center for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上海科技大学教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Insight Note | 智辨系列

总 No.1 期/2025 年 12 月

数字货币：塑造未来金融系统与地缘政治的关键变量

执行摘要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被数字创新重构。这对货币政策的执行、金融稳定的维护、国际贸易的便利化，以及最关键的——支撑全球秩序的地缘政治力量平衡，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变化的速度惊人，从理论讨论迅速发展到现在每年处理数万亿美元交易的实际应用，迫使政策制定者、金融家和技术专家去应对一个比共识形成速度更快的未来。

1.1 两种路径：国家主导 VS 市场驱动

基于前期相关研讨，本报告梳理了全球范围内未来货币形态和金融体系的关键辩论。全球金融体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夹在国家主导的货币雄心与市场驱动的技术颠覆力量之间。在面向未来的货币体系愿景上，存在根本性分裂：一方是务实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将这些工具视为功能上更优越的支付工具，应被整合到现有金融秩序中；另一方则是革命性的、以市场为中心的范式，将数字货币视为一个新的、互联网原生经济体系的基础层，该体系将从根本上重构银行业本身。

同时，这一技术辩论植根于地缘政治基础。数字货币的发展不仅被视为一个金融或技术问题，更被看作是一个全新的、至关重要的战略竞争领域，尤其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从历史看，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共识瓦解后，由美元“嚣张的特权”逐渐演化出多元货币体系。在这一竞争格局中，技术既是竞争的强大催化剂，也是治国方略的潜在工具，挑战着既定的权力动态和金融规范。

针对未来的数字货币，主要经济体所采取了不同的国家战略。美国的特点是市场主导的方法，即私营部门的创新先于监管的正式化，如 Genius 法案所示。

中国的战略是国家指导的、自上而下的，以数字人民币（e-CNY）为核心，构建一个公私混合的生态系统基础，旨在加强主权控制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2026 年，数字人民币明确了将从数字现金时代（CBDC）迈入数字存款货币（Digital Deposit Money）时代。未来的数字人民币是中央银行提供技术支持保障并实施监管、具有商业银行负债属性，以账户为基础、兼容分布式账本技术特点，在金融体系内发行、流通的现代化数字支付和流通手段，具备货币价值尺度、价值储藏、跨境支付职能。

与此同时，欧洲正以其数字欧元项目走上一条更为审慎和谨慎的道路，其主要关注点是在数字时代维护货币主权和战略自主。2026 年将成为其立法确权与技术标准定型的关键期。与此同时，传统商业银行不再坐以待毙，由 ING、UniCredit 等九大欧洲银行组成的财团计划于 2026 年下半年率先推出合规欧元稳定币，试图在央行数字货币缺位的窗口期抢占市场高地。在监管层面，MiCA 法案的全面实施迫使 Tether 等非合规巨头撤出欧元市场并转向资产代币化平台（Hadron），而 Circle（USDC/EURC）则借助合规优势与银行业深度捆绑。

1.2 历史的回响

当前时刻不仅代表了支付技术的演进，也预示着银行业本身可能发生重构，这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芝加哥计划”等历史性改革提案遥相呼应。全额准备金数字货币模型的出现，对延续了数百年的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提出了直接挑战，即狭义银行（narrow banking）的出现。这一发展凸显了开展强有力的国际对话以促进互操作性和建立连贯治理框架的紧迫性，从而防止全球金融体系陷入碎片化、低效且可能充满冲突的境地。

1.3 战略建议

数字货币发展的复杂、多面且常常充满争议的格局，需要一种前瞻性的方法，以平衡创新与稳定，以及竞争与合作。面向数字货币的未来，我们提出如下战略建议：

首先，优先考虑互操作性。一个由相互竞争、孤立的数字货币平台组成的碎片化系统，将代表一种集体失败，削弱了技术所承诺的效率提升。为了避免金融领域的“分裂网”，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袖必须积极致力于发展共同的技术标准、协议和法律框架，以确保不同的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无缝地“相互对话”。这需要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协同努力，以建立技术和监管的桥梁，从而允许价值在不同网络和司法管辖区之间流畅转移。

其次，混合治理模式。早期关于一个纯粹去中心化、无治理的金融体系的乌托邦式愿景，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基础设施而言，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与其追求意识形态的绝对，焦点应放在设计稳健的混合治理结构上。由一组受信任且受监管的实体运营的“联盟式”网络，提供了一个可选的模型。这样的结构可以将分布式账本的技术韧性和透明度，与来自清晰监管框架和有效国际监督的法律问责制和公众信任相结合。

第三，**促进持续的国际对话**。数字货币现在是，并将继续是战略竞争的一个领域。虽然竞争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排除在共同挑战上进行合作。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积极持续的对话，对于管理这种竞争和减轻不稳定与冲突的风险至关重要。这种对话应侧重于在共同利益领域建立共识，例如为跨境支付制定标准，合作打击非法金融和恐怖主义融资，以及为数据隐私和安全制定共同原则。

最后，任何新数字货币体系的最终成功和合法性，将取决于其**提供具体、现实世界效用的能力**。重点必须超越地缘政治和高端金融的高层关切，去解决普通民众和企业的实际问题。在设计数字货币系统时，**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金融普惠**不应是事后的考虑；它应成为政策和创新的核心和驱动支柱。一个能够赋权全球服务不足群体的系统，不仅更公平，而且也更有可能是实现长期成功所必需的网络效应和广泛采用。

第一章、数字货币的两种竞争性愿景

关于数字货币目的和最终潜力，存在两种主要且常常相互冲突的哲学。这些愿景不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在本质上更是迥异，代表了对未来货币概念的根本性分歧。第一种观点是一种务实和演进的看法。第二种观点则是一种革命性的范式转变，完全原生的互联网新经济基础设施。

1.1 务实观点：作为演进支付工具的数字货币

私人数字货币可被视为改善现有金融体系的功能性工具，而非一种新颖的资产类别或对主权货币的挑战。

目前的私人数字货币还存在关键挑战：首先是一个有足够**流动性的市场**，持有者可以投资其数字货币，哪怕是隔夜，以赚取利息的地方。没有这样的市场，会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使其除了即时交易外在经济上变得低效。其次，或许也是最关键的，是**无缝赎回**的挑战。能够轻松在线购买只是等式的一半；用户必须有一个可靠且易于访问的机制，将数字代币赎回为法定货币——例如美元的“绿钞”。这个过程不能仅仅依赖于数字钱包，还需要一个连接数字世界与传统世界的物理和金融网络，涉及ATM机或银行分支等基础设施。这凸显出当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根本性差距，即入口（on-ramps）通常比出口（off-ramps）更为发达，特别是对于需要将数字资产转换为现金以用于日常开支的用户而言。

数字货币的核心支柱是**监管清晰度和合规性**的绝对必要性。一个全面的监管框架对于确保稳定性和公众信任至关重要。该框架必须解决多层次的风险，包括支持数字货币的储备金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管理。它还要求发行方具有高度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此外，在一个基于在线、假名、钱包的环境中，应用强大的“了解你的客户”（KYC）和

“反洗钱”（AML）协议提出了一个艰巨的挑战。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法律和合规障碍。

需要关注数字货币所引发的碎片化的系统性风险。私人数字货币发行的市场驱动、商业性质，即每家公司都建立自己的平台和业务，可能导致未来出现“一百种不同的稳定币”在不互操作的系统上运行。这样一个“非常碎片化的系统”将损害效率、安全性、稳定性和透明度，直接削弱了该技术无缝价值转移的核心承诺。这些不同系统如何“协同工作”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一个核心的、未解决的挑战。

1.2 革命性观点：互联网原生货币

与务实、演进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技术驱动的观点**将当前时刻描述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早期阶段”，而非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增量改进。这个新体系正建立在全新的“经济协调基础材料”之上——即公共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这一观点将数字货币从单纯的支付工具重新定义为互联网原生货币的本质。

该愿景的核心概念是创建一种“**全额准备金的法定数字货币**”，旨在通过从根本上分离支付和信贷功能，成为“最安全的货币”，从而避免了在部分准备金基础上运营的商业银行固有的信用风险。在这种全额准备金模式中，每一个流通中的数字美元都由高流动性、安全的资产一一对一支持，例如存放在中央银行账户中的现金或短期政府国库券。这一设计原则不仅是一项公司政策，而且正在被写入法律；它是《Lummis-Gillibrand 法案》的一个基本要素，该法案强制要求一对一的高质量流动资产储备，并明确禁止无支持的算法数字货币。

这种新形式货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互联网规模的效用**。在互联网历史中，存储和移动数据、信息和通信的边际成本被有效地降至零，从而释放了数量和效用的爆炸性增长。货币也将经历类似的转变，一个存储和移动价值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世界，将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增加

“许多个数量级”。

这种互联网原生货币的效用被两种融合的技术力量进一步放大：**可编程性和人工智能代理**。首先，可编程性允许代码直接与经济交易互动并进行中介，为货币解锁了全新的功能。其次，由人工智能代理而非人类执行的经济活动将出现爆炸性增长。一个单一实体可以部署一千个人工智能代理来执行经济任务的世界，需要一个新的、机器原生的货币基础设施。我们当前的支付系统是为人类中介的交易而构建的，根本不是为这种高速度、大批量、软件驱动的经济协调的未来而设计。

1.3 可能性谱系与调和观点

以上两种观点不仅仅是不同的视角；它们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分歧，这定义了关于未来货币的核心辩论。这是一场**演进模型与革命模型**之间的分裂。演进模型植根于中央银行家和全球金融监管者的经验，以国家为中心，并优先考虑稳定性。它试图通过将新技术谨慎地整合到现有的、国家管理的金融框架中，来利用新技术的效率增益。革命模型则来自互联网原生，以市场为中心，并优先考虑无需许可的创新。它设想互联网固有的去中心化和网络效应逻辑将从头开始创建全新的、更高效的系统，颠覆并最终取代现有结构。其重点在于解锁新的效用，实现互联网规模的增长，并构建一个原生于数字世界的金融系统，而不是为互联网改造模拟世界的系统。

在这一辩证关系中，从货币分类的视角看，可以提供一個至关重要的澄清观点。可以将私人数字货币置于我们熟悉的三层货币体系中：核心是中央银行货币，其次是商业银行存款（广义货币），最后是非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在这个分类中，私人数字货币本质上是“电子货币代币”，类似于支付宝或 M-Pesa 等支付提供商发行的负债。从这个角度看，它们的作用明确是**补充性**的——它们是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补充，而非取代中央银行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

这种传统的分类方法恰恰凸显了全额准备金数字货币的激进，即作为能够接触中央银行储备的实体的直接负债，实际上试图完全绕过货币体系的第二层——商业银行层。这不仅仅是一种新形式的电子货币；它试图为数字时代创造一种新的基础货币形式，与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功能分离。因此，传统框架使辩论的核心问题具体化：数字货币应该被设计成能整齐地融入旧架构，还是应该被用作构建新架构的基石？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当前这波创新浪潮是带来增量改进，还是对全球金融进行根本性重建。

第二章、基础层之争——构建未来金融体系

除了关于数字货币本身性质和目的的辩论之外，还存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支撑未来数字金融的底层技术和治理基础设施。这一基础层的也存在不同愿景。

2.1 Web3 范式：代币化世界的通用基底

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当前时刻的长期意义远不止于数字货币。未来“并非数字货币本身”，而是全面的“Web3 基础设施”，这将“从根本上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结构，而是一切”。在这一宏大愿景中，稳定币仅仅是运行在这个新的、去中心化互联网层之上的一个单一但至关重要的应用——一种数字现金。真正的革命在于基础设施本身，它有望成为一个完全“代币化世界”的基础，在这个世界里，从房地产到证券等任何资产的所有权都可以表示为区块链上的唯一数字代币。

在此背景下，Web3 代表了万维网的下一次迭代，其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去中心化、用户所有权和去信任化的核心原则。Web 2.0 的特点是中心化平台（如社交媒体网络和搜索引擎）控制用户数据，而 Web3 旨在利用区块链技术和基于代币的经济模型，将数据所有权和控制权交还给个人用户。其关键特征——去中心化、无需许可的访问和互操作性——旨在创建一个更开放、更公平、更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去中心化金融（DeFi），涵盖了无需传统中介的借贷、交易等服务，是迄今为止 Web3 范式在金融领域最突出和最发达的应用，展示了这一新基础设施重构整个行业的潜力。这一基础性转变才是真正故事，而数字货币在其中扮演着这个新兴数字经济中原生货币的角色。

2.2 去中心化的局限性与治理的首要地位

尽管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 Web3 基础设施的愿景引人注目，但另一种务实观点认为，“真正的一切都去中心化是一种幻想”。从这个角度

来看，金融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远不止是区块链的核心优势——不可篡改的记录保存。它包括交易、风险管理和争议解决等多个层面，要将这个复杂系统的每一层都去中心化是不可行的。

这一批判将**权衡取舍**的经济学原则引入了技术讨论。虽然去中心化提供了明显的好处，例如减轻了当前中心化金融体系中固有的垄断权力风险，但相信一个系统可以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权威下运作是不现实的。因此，关键问题不是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之间的二元选择，而是一个微妙的设计问题：哪一部分应该去中心化，哪一部分应该保持紧密的中心化？这将挑战从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重新定义为一个复杂的制度设计实践，其目标是在最大化效率和弹性的同时，最小化系统性风险。

在这个新领域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挑战在于：**数据治理**。一个真正的全球金融体系，无论是中心化的还是去中心化的，其根本在于数据的共享。它需要信息跨越国界流动，以促进交易和管理风险。然而，这立即与数据安全、用户隐私和国家数据主权的棘手问题发生冲突。现有的基于银行的体系，尽管有其缺陷，但通过高度监管的“了解你的客户”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该框架为验证身份和防止非法活动建立了明确的责任线。目前尚不清楚一个新的、去中心化的系统如何能解决这个根本的治理问题，尤其是在一个数据和隐私法规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世界里。这一挑战表明，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数据治理框架，一个无缝全球系统的技术承诺就无法实现。

2.3 “经济操作系统”——一个分布式的、受治理的网络

对纯粹去中心化的实践和学术批判，为更成熟、更细致的未来基础设施愿景奠定了基础。区块链网络将超越简单的账本，演变为“通用网络操作系统”，但更具体地说，是“经济操作系统”。这是专门为协调经济活动而设计的软件层，包括货币发行、商业和金融合同的执行，甚至公司实体的形成和治理本身。

这个系统是分布式的，而非纯粹去中心化的。“分布式不同于‘去中心化’，后者意味着无人控制。分布式是多方控制”。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转变：从一个没有统治者的无政府理想，转向了一个共享控制的联邦模型。这一愿景与创建“联盟式基础设施网络”相一致，即由一组受信任且可能受监管的实体共同运营网络。在这个模型中，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的核心原则——如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等机构所概述的操作弹性、结算最终性和基础安全性——将被应用于这些新的区块链网络。受监管的实体将在这些网络的边缘运作，提供入口和出口，并确保遵守金融法规。这种方法旨在将分布式账本的技术优势——弹性、透明度和不可篡改性——与一个受治理、受监管的系统的问责制和稳定性相结合。

第三章、数字货币的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的新舞台

金融体系通过数字货币的转型并非在政治真空中发生。事实上，货币的演变与地缘政治竞争和全球力量平衡的变迁密不可分。数字货币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全新且关键的领域，其驱动力在于对现有货币秩序被侵蚀的感知以及主要国家行为体的战略目标。

3.1 美元霸权的侵蚀与多极货币世界的崛起

从历史视角看，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深刻变革。从 1944 年布雷顿森林协定（该协定确立了以黄金为支撑的美元作为体系的锚）到 1976 年牙买加协定（该协定正式确立了后黄金时代、以市场为基础的美元锚），产生了一个关键的、尽管是非正式的共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是建立在美国致力于维护经济稳定三大基本支柱之上的：**财政可持续性、央行独立性以及健全的金融市场监管框架。**

然而，在过去五十年里，“所有这三大支柱都逐渐崩溃了”。2008 年金融危机后以及 2020 年再次广泛使用的量化宽松（QE）政策，通过将政府债务货币化，打破了财政可持续性和央行独立性的原则。政治压力，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进一步摧毁了整个法律体系和中央银行的信誉，而 2008 年危机本身也削弱了人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监管的信心。这种被感知的侵蚀的累积效应使得对美元的信心变得薄弱。

传统锚的削弱开启了一个“多货币竞争”的时代。全球舞台不再是单极货币体系，而是日益成为一个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竞争的三极体系。这种竞争是“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每个货币集团都拥有独特的优势和致命的弱点。欧元虽然是一个主要货币单位，但没有相应的财政联盟支持，限制了其力量和韧性。人民币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但其全球效用受到其非完全可兑换和在资本管制体系内运作的严重限制。尽管美元的基础支柱受到侵蚀，但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及其在全球

贸易和金融中的现有地位，它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结构性优势。这种复杂而不平衡的动态为“一场持久的竞争”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中长期战略博弈和不稳定的时期。

3.2 技术作为治国方略与战略竞争的工具

地缘政治视角不可或缺。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视中国为其“头号对手”，并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遏制中国”的努力，这一战略明确包括技术和金融领域。在这种现实主义世界观中，技术创新并非中立。像数字货币这样的工具，“显然会成为那些想遏制中国的人的工具”。

这一观点得到了对中美关系的外部分析的有力证实，中美关系日益被一场长期的技术主导权战略竞争所定义。这场竞争涵盖了广泛的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5G 电信、量子计算，以及至关重要的先进半导体。这种激烈的竞争正在推动技术“脱钩”的趋势，导致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技术标准的分化，以及相互竞争的独立技术生态系统的形成。

在此背景下，数字货币日益被视为治国方略和权力投射的有力工具。对于寻求挑战现有秩序的国家而言，数字货币提供了一条潜在途径，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绕过由西方主导的传统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 SWIFT 报文系统。由于美元的核心地位使美国能够将强大的经济制裁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关键工具，因此创建替代支付渠道成为其竞争对手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发展数字人民币（e-CNY）的举动被广泛地从这一地缘政治视角进行解读。它不仅被视为一项国内支付创新，更被看作是一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去美元化”的工具，特别是在其影响范围内，例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之间。

3.3 “地缘政治中立性”的神话

从技术中心视角出发，技术是建立联系和促进一体化的核心推动力。建设“地缘政治中立”的网络的愿景，即创建一个可以为所有用户服务，无论其国籍的通用、开放的基础设，虽然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

标，反映了互联网的原始精神，但当前全球环境的结构性现实表明，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技术平台的真正地缘政治中立性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这一结论基于两条推理线索。首先，基础性基础设施从来都不是真正中立的；它内在地反映了其创造者和主要运营商的价值观、标准和战略利益。互联网本身虽然设计时秉持开放原则，但已成为治理模式竞争的主要战场，任何新的货币基础设施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类似的压力。

其次，主流数字货币的本质削弱了中立性的主张。处理数万亿美元交易并由美国监管公司发行的系统，其本质上是将美元和美国金融监管范围的触角延伸到了数字领域。它远非一个中立的替代方案，反而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元主导地位的強大现代化和加固，使得全球数字经济对美国货币及其法律框架的依赖性更强，而非减弱。

技术中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原则性的呼吁，要求缓和局势，回归一个更合作、更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但结构性现实是，任何成功的全球数字货币体系都将成为激烈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其治理结构、技术标准、产生的数据以及所使用的主导货币，都不会是中立的技术选择，而将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战略谈判和冲突的主题。

第四章：历史注脚与前行之路

关于数字货币的一系列探讨有其历史背景，也指向全球金融的未来轨迹；涉及技术创新，也关乎全球紧迫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4.1 重温芝加哥计划

和数字货币的未来密切相关的历史注脚是欧文·费雪的“100%货币”提案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芝加哥计划”。芝加哥计划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的思想激荡中，由一些顶尖经济学家提出，他们认为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提案的核心是彻底分离银行体系的**货币职能**（货币的创造）和**信贷职能**（贷款业务）。这将通过要求商业银行对其所有活期存款持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来实现。其支持者认为，这样的体系将完全消除银行挤兑的可能性，因为所有存款都将由安全的中央银行货币全额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将切断私人信贷扩张与货币创造之间的顺周期联系，使国家能更直接、更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减轻由私人银行贷款驱动的繁荣-萧条周期。

这一历史性提案与现代全额准备金数字货币的愿景之间存在着惊人而深刻的相似之处，代表了芝加哥计划核心思想的技术实现。这可以通过一个清晰的逻辑进程来理解。首先，传统银行体系建立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之上，银行仅将客户存款的一小部分作为准备金持有，并将其余部分贷出，在贷款过程中创造新货币（以银行存款的形式）。这个体系在创造信贷方面效率很高，但本质上是脆弱的，如果储户失去信心，就容易发生银行挤兑。而所谓“狭义银行”模式将有根本不同。这些专业机构将被要求以最安全的资产——中央银行准备金或短期政府证券——为其发行的稳定币维持百分之百的支持，并且将被明确禁止从事贷款业务。

这种结构完美地反映了芝加哥计划所设想的制度分离。数字货币发

行方成为一个纯粹的支付和存款接收工具，仅履行银行体系的货币职能。信贷职能——即发放贷款的业务——将必须由独立的机构来执行，这些机构将通过股权或长期的、不可赎回的债务来为其贷款活动提供资金，而不是通过可即时赎回的活期存款。

因此，全额准备金数字货币不仅仅是支付系统的技术升级，而是对几个世纪以来主导经济的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直接和根本性挑战。它提出了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即系统性地从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转向狭义银行模式。这样的转变将对经济中信贷的创造方式、金融稳定的未来，以及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中的角色和工具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4.2 面向未来的战略建议

数字货币发展的复杂、多面且常常充满争议的格局，需要一种前瞻性的方法，以平衡创新与稳定，以及竞争与合作。面向数字货币的未来，我们提出如下战略建议：

首先，**优先考虑互操作性**至关重要。一个由相互竞争、孤立的数字货币平台组成的碎片化系统，将代表一种集体失败，削弱了技术所承诺的效率提升。为了避免金融领域的“分裂网”，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袖必须积极致力于发展共同的技术标准、协议和法律框架，以确保不同的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无缝地“相互对话”。这需要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协同努力，以建立技术和监管的桥梁，从而允许价值在不同网络和司法管辖区之间流畅转移。

其次，前进的道路需要拥抱**混合治理模式**。早期关于一个纯粹去中心化、无治理的金融体系的乌托邦式愿景，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基础设施而言，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与其追求意识形态的绝对，焦点应放在设计稳健的混合治理结构上。由一组受信任且受监管的实体运营的“联盟式”网络，提供了一个可选的模型。这样的结构可以将分布式账本的技术韧性和透明度，与来自清晰监管框架和有效国际监督的法律问责制

和公众信任相结合。

第三，**促进持续的国际对话**至关重要。数字货币现在是，并将继续是战略竞争的一个领域。虽然竞争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排除在共同挑战上进行合作。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积极持续的对话，对于管理这种竞争和减轻不稳定与冲突的风险至关重要。这种对话应侧重于在共同利益领域建立共识，例如为跨境支付制定标准，合作打击非法金融和恐怖主义融资，以及为数据隐私和安全制定共同原则。

最后，任何新数字货币体系的最终成功和合法性，将取决于其**提供具体、现实世界效用的能力**。重点必须超越地缘政治和高端金融的高层关切，去解决普通民众和企业的实际问题。在设计数字货币系统时，**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金融普惠**不应是事后的考虑；它应成为政策和创新的核心和驱动支柱。一个能够赋权全球服务不足群体的系统，不仅更公平，而且也更有可能实现长期成功所必需的网络效应和广泛采用。

Disclaimer: 本文由 AI 参与整理，若发现任何事实性问题，请联系我们：CEISD@Shanghaitech.edu.cn